



肝胆照人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莱西县委员会选编

肝 胆 照 人

政协莱西县委员会

政协莱西县委员会选编

一九八六年三月

前 言

开放搞活、实行改革，为神州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使伟大祖国进入了一个振兴的黄金时代。作为这个时代的新人，必须有一个崇高的理想，人无精神则颓废，国无理想则衰败，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。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略。

人生的真谛不在于索取，而在于贡献。岁月悠悠，人生易老，值此光景无边，好春常驻的大好时机，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富强、人民的富裕，积极地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在做贡献的路上，是需要有一点卞和献玉精神的。

我们选编的这本专辑中的曲啸、潘恩良诸同志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能在逆境中泰然自若，以刚毅大度的革命风格、浩瀚的胸怀、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，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竭忠尽智，埋头苦干，奋斗不息，成为当代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社会主义的楷模。祖国的历史就是具有

这种精神的人们谱写的。

“一花引来万花香”，是我们选编这本专辑的美好愿望，诸位读了这些仁人志士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先进事迹后，将会在两个文明比翼齐飞的光明前景中绽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。

政协莱西县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八日

目 录

-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
——曲啸同志谈理想与追求…………… (1)
- 热血洒在辽河湾的香港人…………… (28)
- 心之所向 九死未悔…………… (56)
- 一人心灵美 换来三家乐…………… (69)
- 塑造美的心灵…………… (86)
- 朴素的语言 高尚的情操…………… (231)

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

——曲啸同志谈理想与追求

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青春呢？我想在这里同大家谈谈我的情况。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。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。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度过的。解放后，是共产党用助学金把我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。通过党的多年教育，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，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。但是，人生的道路，从来不是笔直的，即使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，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也会遇到许多曲折和不幸。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切呢？怎样使自己生活得更更有意义呢？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我，人活着应该有一个信念，有一个理想。我认为，一个人的理想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，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这样的

理想，这样的人生追求，才能说是有意义的。

一九五七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八天，就被错误地打成“右派”，送去劳动教养。我觉得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、自重、自爱、自强。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颓废了，那是不应该的。

我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。一九五七年，我刚毕业八天就赶上了“反右”斗争，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，我是想不通的。在决定开除我团籍的大会上，让我表态，我说：组织上既决定开除我团籍，我保留意见。我对同学们说，在离开培养我多年的团组织，离开同志们的时候，我心情是沉重的。我希望能若干年后，我们再见面时，彼此能于心无愧地告诉对方：毕业之后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。我流着眼泪离开了团组织，也离开了母校。

离校后，我被分配到辽宁新民师范学校。我仍然满腔热情地工作，加之我热爱体育活动，青年朋友们比较愿意和我接近，没想到这又是一条罪状。

有位领导问我：“现在同学管你叫老师，而且愿意接近你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把脸一

沉说：你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。不容分说就将我开除公职，送到凌源县劳动教养。

我打起行李主动到教养院报到去了。我想，到那里去不就是劳动吗？劳动完了，就回来了。其实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这一进去，可就不能随便出来了。当时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。

当时，我们的活儿主要是耙地种稻。虽然我不应该到这里来，但我通过劳动体会到了种稻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，我们又被调到开原，修清河水库。后又修大坝、建楼房、种地，总之各样的活儿都干过。因为我想着劳动一段时间后还要出去做教师，所以我还坚持学专业。

我觉得，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、自重、自爱、自强。自尊就是为了人的尊严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，轻易丢掉自己的人格。自重就是处理任何问题应该慎重、仔细，不能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，或无根的浮萍。自爱就是不断地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。自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人应该自强不息，一个青年人应该有一种决心，用自己

的劳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一道痕迹，对后代人有所教益。这是我生命的真正价值。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颓废了，悲观了，甚至走上绝路，那是不应该的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，我被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解除了劳动教养。被打成右派那年，妻离子散，现在，我告别了母亲，孤身一人来到兴安岭脚下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安了身。从此，我成了牧马人。

我把巴甫洛夫的名言“原谅自己，就是堕落的开始”，写成条幅，贴在墙上。由于我的表现好，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就被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解除了劳动教养。

我是一九五六年结婚的。可我成了右派后，曾经和我“海誓山盟”的妻子向我提出了离婚，我感到很突然。但我又想，没什么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既然不能给你幸福，我还你自由。我们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我想要，可法院的同志说：“你是右派，要什么孩子？”这样我妻离子散了。摘了帽子后，我满怀希望地走向新的生活道路，可社会上的一些事使我很痛心。我想教书，可没有一个学校要我，一听

说是右派，人人都避而远之。我曾偷偷地去看孩子，可托儿所的阿姨对我说：“这孩子的爹是右派、反革命，死了。”我一听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心想：人们说我已死了，孩子才四岁，不要因我而受牵连。我忍痛没暴露身份，怅然离开了托儿所。

我母亲希望我能留在身边，可我哪能靠母亲来养活呢！我要自己劳动。邻居们向我投来白眼，比拿鞭子抽我还难受，这使我感到，家乡不能呆了，只好走。于是我告别母亲，离开了家乡，来到兴安岭脚下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安了身。农场让我养马，从此我成了牧马人。

我是学心理学的。我根据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来驯养马。

看到我驯养的马能够犁地了，驾车了，心情很激动，我终于能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了。我渐渐地和马有了感情，春节时我写了副对联，贴在马圈。上联是“为放马战槽头哪怕披星戴月”；下联是“垦荒地种五谷何惧宿露餐霜”。横批是“乐在其中”。

驯马一段时间，我又被选拔当了小学教师。后来，由于我这样的人“不适宜于在边疆

工作”，又被迁到辽宁，在一个劳改农场小学教书，并同当地一位农村姑娘成亲。

没想到，对联被传扬开了。一位领导找到我说：“听说你是大学生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他问：“你能不能教书？”我说：“我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。”他说：“那好，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，你教他们吧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右派身份，恐怕不合适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这里山高皇帝远，能教就教吧。”他很坦率地又说了一句，“你别说错了就行。”从此我做了教师。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，放马住的茅草房是教室；找了些木板一钉，高点儿的是课桌，低点儿的就是板凳；用块铁皮涂上墨汁，就是黑板。开学时，来了十三个小孩，根据实际程度，分了五个年级。学校条件虽简陋，上课却很正规，我一个人教这五个年级的课，是很辛苦的。除了课堂上课外，我还领孩子们到野外去上课。在我们地区学校的统一考试中，我教的班取得了平均九十分的成绩。

后来，我又被迁到辽宁，因为像我这样的人“不适宜于在边疆工作”。于是我又在一个劳改农场教小学二年级，这一年我工作积极，同

志们选我为优秀教师，可领导不批，说：“右派不能当先进工作者。”不是摘帽子了吗？“摘了帽似乎也不行。”言外之意是摘了帽也是右派。

在这里许多同志关心我，建议我成家。我想，谁家的姑娘愿意找一个右派！我对此也不积极。后来，一位老司机愿意把他的侄女介绍给我。这个姑娘条件很好，论家庭出身，是贫农的女儿，父亲是土改时入党的老共产党员，是农村的生产队长。她自己是妇女队长，还是共青团员，比我小十来岁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。后来，这位老司机把侄女叫到了我们农场。我们见了面。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，很美丽。我如实地介绍了我自己，特别在说到我是右派时，我还加重了语气，谁知她并没害怕，说：“我听叔叔说了。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。”我一听，这话真是有份量，谁还会故意当右派？这么多年，谁也没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只听到什么“根深蒂固的、由来已久的，只有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。”这姑娘说了这句话，真是“良言一句三冬暖”啊！我心里一热乎，就同意和她结婚。我们当时订了三条：第

一孝敬父母；第二不吵架；第三不能轻易离婚。姑娘一分钱的彩礼也不要，我非常感动，就把我的旧表给了她，可她还是不要。我想总要有点纪念品才好，我给她买了双鞋。第二天我们就去登记，第三天就成亲了。

我们结婚时，既没有隆重的仪式，也没有丰盛的酒宴，连一个来宾也没有。我们的新房很简陋，用几张桌子搭成了床，唯一的家具是我劳动教养时用过的书箱。我身上只有十一元钱，她只有五元钱，买了一个饭锅，就花了七元多。虽然物质条件不好，但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物质条件换来的。第二年，我们生了个胖小子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一夜之间我又变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批斗会昼夜不断，最后被定为所谓的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
可是好景不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一夜之间我又变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批斗会昼夜不断，家也被抄了。

我的罪名越来越多，说我向学生散布反动言论，思想极端反动，图谋不轨。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“文革”前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教室批改作业，突然进来一个女学生说要找我谈一谈。我并不认识她，问她是那个班的，她说是中学部三年级的。我是小学老师，不认识这个学生。她说因为她父亲犯过罪，思想上有包袱，应该怎么解决？我说，“你父亲有罪不等于你有罪，周总理说过：家庭出身不能选择，个人前途可以选择。你应该做革命的接班人。”我还举了一个例子，说：旧社会能上大学的劳动人民家庭子弟不多，所以解放初期，北京的大学生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约占百分之八十，共产党对这些人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你不必悲观。

可是在批斗会上，这个女同学的班主任拿着检举信，说我进行反革命串连，见到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就往身边拉拢；说我散布全国地富反坏右占百分之八十，而且让那个女孩子接反革命的班。千万别接革命的班。我当然不承认，别人就用皮带打我。到后来给我平反时，法院在沈阳找到了这个女孩子，她出证说：那次找曲啸谈话是班主任老师派我去的，而且说是党交给的任务，并且整了个材料让我抄，让

我签了字。这个假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。

批斗会上挨打是很厉害的。记得一次批斗会上，有位专政队长看我不说话，就喊“负隅（隅）顽抗！”我当时出于教师的本能说了句：“那个字念‘隅’。”这下可坏了，招来了一顿棍棒。他们说：“革命群众念错一个字，你就恨之入骨，你反动透顶！”

批斗会越开越频繁，最后我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
我和亲人在哭声中分手了。专政队强行发给了我一份所谓“离婚证明书”。我爱人和孩子被赶到乡下，生活处于绝境。后来，我母亲也死了。

一天，我爱人带着孩子，扶着婆母到监狱看我。我面对着一家老小，真是心如刀绞。我母亲把她的一床褥子给了我，说：我岁数大了，这次入狱，我怕见不着你了，以后想起妈妈，你铺上褥子就象看到我一样。

我爱人从身上脱下一件棉背心给我披上，那时是十一月底了。孩子不懂事，刚会叫爸爸，他一边摸着手铐一边问：“爸！啥？啥？”我怎么能告诉孩子这是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生死存亡

的手铐呢！当时，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对爱人说：“玉兰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爱人听我这样一说就哭了。她说：“为什么你要赶我走呢，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。”我说：“不是我们感情不好，当初你不嫌弃我是‘右派’和我结婚，我一辈子都感谢你。可现在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，你才二十几岁，怎么可以因为我而断送你的一生呢。”爱人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我自己能劳动，我等你回来。”我又说：“为了孩子你不要等我了，你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当一辈子‘反革命子弟’。如果你珍惜我们的感情，你就答应我的要求：第一，母亲死后，替我把母亲埋了；第二，希望把孩子带大，等他长大成人后，再把我的事情告诉他；第三，你生活实在困难，你一定和一个朴实的农民结婚，这就算对得起我了。”就这样我们在哭声中分手了。后来专政队强行发给了我一份所谓“离婚证明书”。以后我才知道，我进狱后，专政队把我爱人和孩子都赶到了乡下，而且不让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在一起。母亲回到了家乡，我爱人和孩子被赶回了娘家。更为狠毒的是，把判我徒刑的大布告贴到了岳父的

家门口，老岳父受不了这种打击，得了重病。大妻弟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得病死了。二妻弟是部队副连长，也因受我的株连，转业了。许多亲戚受了株连。我爱人和孩子由于生活不下去，不得不到山海关北边一个山沟里找一个远房姨母躲一躲，求个生存。后来这位姨母也死了，我爱人又得了重病，孩子也有了病，娘俩处于生活的绝境。从此，我和他们也断了音讯。后来母亲也死了。

在狱中，我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，感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许多事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，它完全是一种邪恶势力借党的名义制造的一场灾难。而且，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不会长久的，党迟早要恢复自己的威望，我的问题总会解决的。因此，我利用同罪犯在一起生活的机会，收集资料，准备将来研究罪犯心理学。

在监狱中睡不着觉时，我曾认真地思索：曲啸，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？我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我回想着我走过的历程，旧社会我的家庭很苦，我整个童年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，过着亡国奴的生活。一九四六年，我们那里来了八路军，才解放了，当时我是中学生。一九